

生态话语的文学建构与传播

——以《老人与海》为例

朱亚晴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6日

摘 要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被誉为“对海洋和渔夫刻画最为深刻”的文学佳作。在这部小说中, 海明威将大海塑造为具有独立生命的审美对象,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大自然深邃神秘的特质, 深刻传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本文从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 系统考察《老人与海》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悲剧性冲突的双重面向, 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下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如何加剧生态失衡, 并探讨自然对人类破坏行径的必然惩戒所蕴含的生态警示意义。在此基础上, 本文尝试引入传播学的理论视角, 将《老人与海》视为一个承载生态信息的“传播文本”, 考察其生态话语的建构方式、警示性叙事策略及其跨时空传播的社会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老人与海》通过故事化、情感化的叙事策略, 将抽象的生态理念转化为具体的人物命运, 使读者在审美体验中完成生态认知的“情感卷入”; 同时, 该作品自1952年问世以来, 借助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实现了生态观念的跨文化、跨时代传播, 成为全球生态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 生态文学批评与传播学的跨学科融合, 有助于突破当前生态意识传播面临的“绿色传播困境”, 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共识建构提供新的理论路径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生态文学批评, 《老人与海》, 人与自然, 传播学, 环境传播

Literary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aking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s an Example

Yaqing Z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Received: July 21, 2026; accepted: August 18, 2026; published: August 26, 2026

文章引用: 朱亚晴. 生态话语的文学建构与传播[J].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8): 280-288.
DOI: 10.12677/jc.2026.148228

Abstract

Ernest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has been acclaimed as the literary masterpiece that "portrays the sea and fishermen most profoundly". In this novel, Hemingway depicts the sea as an entity with an independent life and an object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vividly revealing the elusive and mysterious qualities of nature while profoundly conveying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ual dimensions of harmony and tragic conflic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revealing how material desires and spiritual need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thropocentric thinking, exacerbate ecological imbalance. It also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warnings embedded in nature's inevitable retribution against human destructive action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reating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s a "communicative text" that carries ec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examines its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its cautionary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its mechanisms of social influence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rough its story-driven and emotionally engag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ransforms abstract ecological concepts into concrete human destinies, enabling readers to achieve an "emotional involvement" in ecological cognition through aesthetic experience. Moreover,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52, the novel has achieved cross-cultural and cross-temporal dissemination of ecological concepts through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coming an integral part of global ecological cultural mem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ecocritic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can help overcome the current "green communication dilemma" fac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pathway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nsensus 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Keywords

Ecocriticism,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Man and Nature, Communication Studi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论

(一) 生态文学发展背景

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的侵蚀促使生态危机频繁爆发,进而催生出文学批评领域的新分支——生态文学批评。自工业文明发端以来,人类改造与支配自然的主观意愿及技术能力持续增强。这一进程的积极效应在于显著提升了人类的生存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负面后果——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日益失调,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矛盾愈发尖锐。面对持续恶化的生态困境,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强劲的绿色思潮,生态文学批评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本身即是一场“话语的传播”——它不仅仅是学术范式的转换,更是一种以文学为媒介、以生态意识为内容的观念传播运动。

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人口膨胀、能源危机与环境恶化等问题愈演愈烈,严重危及人类自身存续,这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由此极大推动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演进。作为一种遍

及全球的文学批评动向,生态批评的广泛传播自有其深厚的哲学渊源与现实诉求;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被确认为国际社会共同目标的时代语境中,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更显得格外突出。生态文学批评聚焦于文学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关联,致力于挖掘文学作品中的生态价值,为深入思索和正确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开辟了全新视野[1]。

生态文学跨越文学与生态学界限,以独特视角剖析文学作品中的生态内涵,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为人类重新审视自身行为提供启示。从传播功能的角度而言,生态文学承担着“环境传播”的重要使命——它通过审美化的叙事将生态知识、生态伦理和生态价值观传递给公众,生态文学承担着唤醒生态自觉、形塑生态观念、推动生态实践等多重社会职责。它是自然生态、社会现实、公众环境意识与审美体验相互交融的产物。其批评矛头并不针对任何个体或特定人群,而是指向一切有悖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根本旨归在于涵养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进而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进、互利共生的良性关系。

(二) 生态文学发展历程

生态文学批评以文学文本与物理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作品中的生态意蕴,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认知维度[1]。20世纪70年代起,部分文学研究者出于保护生态的现实关切,开始借助文学叙事唤起公众对自然地位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蕾切尔·卡森(1962)以细致的叙述展现了农药滥用所引发的生态灾难,显著提升了社会对环境议题的敏感度,也推动文学界审视文学反映生态危机的可能性,由此揭开了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序幕[2]。约瑟夫·米克于1972年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率先提出“文学生态学”概念,主张对文学作品中涉及生物主题的内容展开研究,这一主张推动了文学批评领域对生态问题的关注。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在《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实验》一文中正式引入“生态批评”这一术语。1993年,首届全美生态批评学术研讨会在科罗拉多州举办,此后生态文学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生态文明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 1995)在《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与美国文化的形成》著作中,深入探讨美国文学传统中的自然书写,提出“生态中心主义”批评理念,强调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式,从生态整体视角解读文学文本,挖掘作家对自然生态的深层认知与价值塑造。

生态批评理论从西方到东方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传播学课题。在这一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学者、译者)、传播内容(生态批评理论)、传播媒介(学术期刊、译著、学术会议)和受众(国内学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链条。王诺(2003)作为国内生态文学批评的开拓者之一,《欧美生态文学》一书系统梳理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演进脉络及代表性作家作品,同时将西方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引介至国内学界[3],后又在多篇论文如《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2006)里持续深化对生态批评本土化路径的探索,推动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生根发芽。曾繁仁(2007)的《生态美学导论》从美学维度拓展生态文学批评范畴,将生态美学理念融入文学批评实践,提出文学应构建人与自然“诗意栖居”审美境界,以美学力量引导生态保护意识,丰富了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层次与实践指向[4]。

当下,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热点聚焦于:跨学科融合,与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携手,全方位剖析生态问题背后的复杂成因;挖掘少数民族及边缘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全球生态修复提供多元文化方案;借助新媒体文学形式,拓展生态文学传播与批评空间。与此同时,传播媒介的变革正在深刻重塑生态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生态。从传统纸质媒介到数字媒介、社交媒体,生态文学的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受众参与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随着生态科技发展,其有望与科幻文学深度结合,前瞻性探讨人类生态远景;且在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大背景下,国际间生态文学批评交流将愈发频繁,共同绘制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蓝图。

(三) 《老人与海》生态批评研究史述评与研究空白

自生态批评理论兴起以来,《老人与海》便因其独特的海洋叙事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书写而成为该领域备受关注的分析文本。对既有研究的系统梳理显示,学界对该小说的生态解读大致沿三条路径展开。

第一条路径聚焦于小说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阐发。较早的研究者如 Rueckert (1978)在探讨海明威的自然书写时即指出,桑提亚哥将大海视为“女性”且以“la mar”相称,体现了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与情感投射。国内学者张芬(2017)进一步认为,老人对海鸟、海龟及大马林鱼的同情与共感,构成了其对自然万物“同伴意识”的文学表达,彰显了海明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自觉[5]。

第二条路径则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冲突及其悲剧性意涵。罗江霞与刘传江(2016)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认为桑提亚哥与马林鱼的搏斗本质上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而最终仅拖回一副骨架的结局则预示了人类征服自然之必然失败[6]。关华(2021)在悲剧解读中进一步指出,老人的失败并非个体能力的失败,而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在自然法则面前的溃败[7]。许晓英(2018)则从生态自然观的角度强调,鲨鱼群对大马林鱼的啃食可视作自然对越界行为的惩罚性回应。

第三条路径兴起较晚,侧重从生态美学或后人类视角进行再阐释。赵靓(2019)提出应以“生态整体主义”重新审视小说中的二元对立结构,认为海明威在叙事中实则暗含对主客二分的消解尝试[8]。部分海外学者如 Christofolletti (2024)则将小说置于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当代语境下重读,挖掘其中的预警性书写[9]。

综上,既有研究虽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三方面的明显不足。其一,现有解读多停留于文本内部的生态意涵挖掘,侧重于“作者表达了什么”或“文本反映了什么”,而较少追问“这些生态观念如何被读者感知、接受并传播”。换言之,学界对《老人与海》生态话语的传播机制鲜有系统考察。其二,既有研究虽偶有提及小说的社会影响[2],但往往将“传播”仅仅视为作品问世后的“延伸效应”,而非将其视为文本叙事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未能揭示海明威自身如何通过叙事技巧来“编码”生态信息以优化传播效能。其三,生态文学批评与传播学的跨学科对话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将《老人与海》同时作为“文学文本”与“传播文本”加以整合分析的方法论框架。正是基于上述研究空白的识别,本文尝试引入传播学的理论资源,将小说的生态话语建构、叙事策略及其跨时空影响机制纳入统一的分析视野,以期在生态批评的传统议题上贡献新的认知增量。

本文借助传播学视角,将《老人与海》解读为蕴含生态信息的传播文本,探究其生态意识的编码逻辑、叙事手法及其传播效能。研究拟围绕生态话语建构、文学叙事的环境传播功能及受众影响机制三个层面展开,以期促成生态文学批评与传播学的交叉融合。

2. 生态文学批评视域下《老人与海》中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探究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国际共识的时代背景下,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日益凸显。该批评范式主张人类实现生存范式的根本转型,即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导模式转向以生态整体为价值坐标的新范式。其批判指向并非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而是剑指反生态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旨在培育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意识,构建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和谐关系。

《老人与海》意蕴丰厚、内涵深广,堪称文学经典,可从生命观念、生态意识、伦理维度等多重路径加以解读。就生命观而言,小说主人公桑提亚哥并非为一己之利而滥捕海洋资源的“掠夺者”形象;相反,他敬畏自然、珍视生命,展现出鲜明的生态关怀与道德自觉。

例如,他会为海鸟寻觅休憩之所而心生忧虑;当目睹或听闻人们残忍对待海龟时,他禁不住以己度

人,把大海视作秀外慧中的女性,把大马林鱼看作至亲或知交,处处浸染着自我的影子,诸如此类的表现皆体现出他对自然生命的敬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桑提亚哥对自然的尊重与热爱,本质上是一种“生态话语”的建构与表达。传播学者认为,话语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塑造认知、建构意义的力量。海明威通过对桑提亚哥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将“大海是美丽聪慧的女性”“大马林鱼是亲人或挚友”等生态观念编码为文学话语,经由小说的传播,这些话语得以进入公众的认知框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从生态维度审视,桑提亚哥既对大马林鱼怀有同伴之情,又因谋生所需而无法回避捕鱼之行,这构成了其行为的内在张力。并且,面对他人的嘲讽,作为无畏的强者,他必须前往深海捕获一条大鱼以彰显自身实力。这意味着,一方面,人类需与自然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人类又不得不与自然进行抗争。这两种观念形成鲜明反差,海明威对此进行了对比性的刻画。比如,在与大自然激烈搏斗之后,老人空手而归,心中满是愧疚。然而在睡梦中,他又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愉悦。《老人与海》对那些表面佯装“受害者”实则为满足私欲而掠夺大自然的野蛮行径予以批判,传达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该小说创作于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复苏的历史阶段,彼时社会普遍追求物质享乐与奢华生活,而主人公桑提亚哥却甘于简朴清贫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位生活节俭却意志坚韧、永不言败的老渔夫,他始终恪守“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能被打败”的人生信条。其出海所乘船只的帆上缀满面粉袋片拼缝的补丁,栖身的棕榈窝棚陈设简陋,日常穿着的衬衣亦布满各色补痕。这无疑体现了作者对人类朴素生活方式的倡导,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活的追求。在那个时代,传统思想的禁锢使人们坚信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态和环保意识的缺失,致使资源过度消耗,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然而,《老人与海》所承载的生态意识及其倡导的简朴生活方式,在当代社会仍具现实启示意义。这恰印证了文学作为一种“生态传播媒介”的独特功能——它区别于新闻报道、科普文章等直白传递生态信息的方式,而是借助故事化、情感化的叙事策略,将生态理念融入人物命运与情节推进之中,使读者在审美愉悦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生态价值观。已有学者如张芬(2017)在论及这一情节时,着重强调其“体现了海明威对简朴生活方式的倡导”,这一判断固然准确。然而,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桑提亚哥简朴生活的描写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可感知的“替代性生活方式”的想象空间。在二战后美国消费主义勃兴的传播语境中,这一形象通过小说的广泛流布,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主流价值进行“反编码”的话语实践——它不以说教姿态批判物质主义,而是以具体人物命运的审美呈现,诱导读者在情感认同中自发地质疑消费逻辑的正当性。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传播特质,正是生态文学相较于其他生态传播形式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桑提亚哥将大海视为美丽而慈祥的女性,既善于欣赏与赞美海洋之美,亦能包容其残酷无情,这充分折射出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切向往,以及对自然万物由衷的热爱与敬畏。长期以来,人类惯于以自我为中心定位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自视为自然的主宰,无度索取自然资源,导致能源危机加剧、环境问题恶化。而《老人与海》所彰显的生态智慧与对自然的敬重立场,无疑构成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且这种批判意识在当下仍具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

(二) 人与自然的冲突探究

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从未停歇,其间生成的种种悖论,常成为悲剧的源头。人类命途多艰,前进路上面临重重阻碍。借助生态批评的透镜观察,《老人与海》不仅再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格局,更揭橥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难题,同时着重彰显了人即便身处逆境亦不轻言放弃、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以及泰然处之的乐观情怀。

(1) 人类物欲驱动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悲剧性失衡

人类作为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生存须臾不能脱离自然,

需持续与之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然则人与动物的根本分野在于，人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创造和生产生活所需之物。《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桑提亚哥已连续八十四天出海空手而归，在生存重压下，人仿佛沦为物欲的驱动对象。为维持基本生计，他不得不再次出海，与自然展开博弈，向海洋索取生存资源。在人类向自然索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甚至常常破坏自然环境[10]。从这一角度而言，人与自然的冲突具有永恒性和必然性，悲剧似乎成为人类难以逃脱的“命运枷锁”。尤其在异化劳动盛行的时代语境下，财富积累俨然化身自我实现的终极指标，亦被视作判定人格独立与思想解放的绝对标准。为纾解无尽物欲，人类对自然展开无度征用乃至野蛮攫取，致使生态系统原有的固有平衡毁于一旦，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中的物质欲望并非仅仅源于人的自然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建构与放大。广告、影视、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不断塑造和强化着“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将物质财富的占有等同于个人价值的实现。这种经由媒介传播的消费主义话语，正是驱动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的重要文化动因之一。

(2) 人类精神需求加剧的人与自然悲剧性冲突

人类需求具有多重维度，除物质层面外，还涵盖精神层面的追求。《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桑提亚哥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展现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特质。“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是他始终秉持的人生信条。连续八十四天出海空手而归，使他饱受同行与邻里的奚落，处境窘迫。在桑提亚哥看来，这样的生活充斥着屈辱与难堪，尊严尽失。他渴望获得外界的理解、认可与尊重，期盼通过捕获大鱼来向那些冷眼相待者证明自身的实力与勇气，从而重新赢回他们的敬意与钦佩[6]。因此，桑提亚哥在海上与马林鱼及鲨鱼群展开殊死搏斗，始终未曾言弃。正是这种对认可、尊重与崇敬的强烈渴求，驱使他一次次驶向远海，在一次次与自然的较量中确证自我价值，捍卫“人之为人”的主体尊严，以充盈精神层面的需求。传播学中的“符号互动论”指出，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身份是在社会互动中经由符号交流建构而成的。桑提亚哥之所以执意通过捕获大鱼来证明自身，根源在于他在社区中长期遭受同行与邻里的讥讽与否定——这些来自外部的评价性信息经由日常传播渗透至他的自我认知结构，使其深陷“屈辱与难堪”的情绪之中。他试图凭借一次成功的捕猎来重置他人对自己的认知图景，重塑自身的社会身份。这种对“传播性认同”的强烈诉求，构成了他持续与自然抗争的重要心理驱力。然而，这一行为逻辑亦在客观上加剧了人与自然的悲剧性冲突。

(3) 生态反噬：自然对人类失范行为的必然回应

共生共荣是人与自然之间亘古不变的相处法则。人类若以善意待之，自然必慷慨回馈；反之，若因贪婪而悖逆生态铁律，肆意扰动天地秩序，自然必将以同等甚至更为暴烈的方式进行反噬。当下气候变暖、物种锐减、生态多样性萎缩等现象，既是自然的无情惩戒，亦为现代文明的悲剧缩影。海明威作为一位具备生态敏感性的作家，深刻体认到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根本价值。在《老人与海》中，他虽然倾注大量笔墨塑造桑提亚哥的硬汉形象，竭力颂扬其“可被摧毁，却不可被战胜”的铮铮铁骨，却终将其推向悲剧结局——老人的小船突遭鲨鱼群围攻，最终仅拖回一副硕大的马林鱼骨架，黯然返港。这一安排绝非偶然，而是意在映衬人类在自然伟力面前的脆弱与渺小，昭示违逆自然规律者必受其反噬的深刻教训。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与侵蚀，早已将悲剧烙印在命运轨迹之中，海明威对此展开深切反思，并重新考量了人与自然的应然关系。

(4) 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引发的双重悲剧

“自然乃生命之源泉，人与自然构成生命共同体”，由此推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乃是应有之义。人类在对自然进行干预与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维系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老人与海》中，海明威以桑提亚哥出海捕鱼作为开篇与收尾，构成首尾呼应的环形结构。其间，作者以大量篇幅细腻铺陈老人与大海、大马林鱼及鲨鱼群搏斗的历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顽强不屈、永不言弃的

奋斗精神。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捕获的大马林鱼被啃食殆尽，桑提亚哥仅带回一副鱼骨架。桑提亚哥的悲剧结局实则具有必然性，因为他真正的对手并非那条大马林鱼以及后来与其抢夺食物的鲨鱼群，而是那难以征服的大自然，他所直面的是整个自然力量，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缘由。《老人与海》的悲剧性结局深刻昭示：在社会文明的演进历程中，若人类对自然只知索取而不知回馈、仅重利用而疏于守护，则必然引发生态系统的退化，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渐趋失衡。就其一端而言，自然生态将因人类过度的干预行为而遭受严重破坏[5]；从另一层面来看，人类自身亦难以实现其预期的发展目标。毋庸置疑，这已然构成人与自然双双受困的双重悲剧格局[6]。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双重悲剧还构成了一个深刻的“生态警示”——它通过文学叙事的方式向读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必然招致惩罚。这种警示性叙事在传播学上被称为“风险传播”，其目的在于通过具象化的故事唤起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感，从而促使人们改变行为方式。《老人与海》的悲剧结局之所以具有持久的感染力，正是因为海明威将抽象的生态规律转化为了一个具体可感、令人动容的人生故事。

3. 生态文学批评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探索

文学批评视角剖析这部经典之作，能够挖掘出其中蕴含的生态意义与价值。该文学作品中潜藏着生态保护理念，促使我们重新考量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视并投身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以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理性对待并自觉回归自然之道

我们由于过度向自然索取，遭受了自然的反制。在全球诸多地区，生态破坏的情形令人触目惊心。文学批评界普遍认为，在生态文学创作进程中，应以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和批判思维，展现生态困局，推动人类深入反思，进而理性地对待自然并自觉地回归自然怀抱，遵循自然规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于小说《老人与海》里，作者海明威以老人桑提亚哥“连续出海八十四天，却一无所获”开篇。这般特定的故事场景设定蕴含着深刻寓意。

一无所获的原因在于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致使众多物种走向灭绝。相应地，人类也受到了大自然的回击。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然而，生态意识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研究表明，中国生态文学面临着受众与之隔膜、缺乏社会辐射力的现实困境。生态文学的宣传目标与文学审美属性之间存在内在冲突，生态文学的终极忧虑与人类现实生存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传播障碍；而在传播流程中，信源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不足、刊载媒介影响力弱、信息过载等因素进一步削弱了生态信息的传播效果。这一“绿色传播困境”提醒我们：仅仅创作出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这些作品如何有效地抵达受众、如何被受众理解和接受。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发展并非相互矛盾，二者实则相互促进、彼此影响。唯有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理性对待自然，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愿景。

（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老人与海》的生态警示与呼吁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核心追求，应当是号召人类守护环境、珍视地球，重新投入自然的怀抱。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故事背景被设定在茫茫大海上。老人独自在无垠的大海中奋力拼搏，其身影显得那般孤独、渺小，最终故事以老人的失败落幕。这一情节巧妙地暗示了人类妄图征服自然所面临的必然悲剧。就像故事结尾处，“它(鱼的骨架)如今不过是垃圾了，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人类漠视自然规律，企图通过征服自然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肆意破坏与人类生存紧密相连的地球生态环境，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这无疑是海明威留给全人类的深刻警示。

从环境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采用的是一种“警示性叙事”策略。环境传播

研究者指出,生态传播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信息的准确传递,更有赖于以恰当的叙事手段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与认知重构。海明威将抽象的生态规律具象化为桑提亚哥的个体命运——其孤独处境、顽强拼搏乃至最终的败北——使读者在情感层面经历了一场“生态体验”。经由叙事达成的这种“情感卷入”效应,远比直白的说教更能促发读者对生态议题的深层关注与批判性反思。

生态价值观规劝人类克制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逐,涵养对大自然的“完善、完美、亲近、和谐”之审美意趣与精神向往,进而实现心灵层面的返归自然。部分论者认为,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崇尚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力主人面对任何强大对手时皆不可言败。然而,将此逻辑简单挪移至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场域,显然失之偏颇。将自然置于人类对立面、一味强调以人力征服自然的观念,既荒谬且有害。自然乃是人类栖居的家园,而非敌手或征服对象;同时,人类合理有序的活动亦能促进自然生态的良性演变。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作者在老人的梦境中反复呈现如下意象:出海前孤苦无依的老人与返航后精疲力竭的老人,皆在梦中目睹了金色沙滩、与人类安然共处的雄狮,以及怡然自得的人间图景。这无疑寄寓了海明威对人类重返自然怀抱的热切呼唤。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

“万物凭借和谐而生,依靠滋养而成。”《老人与海》承载并传播了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小说结尾处,桑提亚哥在反思失败缘由时坦言“只怪我出海过远”——这一自省之言暗示了人类活动逾越自然边界的事实。人与自然本应和睦共处,一旦“过度越界”,则和谐状态将被打破,甚至滑向与自然相对立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文学是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时代变迁的忠实见证者。我们应当秉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这一生态文明的基本准则与逻辑,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竭力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仅是一种伦理主张,更是一个需要通过持续传播来建构的社会共识。传播学者认为,社会共识的形成依赖于信息的持续流动、话语的反复生产和意义的共同建构。生态文学作为这一传播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审美化的表达将“和谐共生”的理念嵌入文化记忆之中。正如《老人与海》所示,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影响力——自20世纪中期以来,这部小说的生态理念已深刻感染了全球亿万读者,这充分体现了文学传播的独特力量。面对生态危机与生存挑战,我们应增强忧患自觉,涵养对自然的热爱,展现自然之美与本质特征,汇聚保护自然的强大力量[7]。

无论是从《老人与海》所传达的生态理念,还是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追求,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教训来看,都明确昭示着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让人类在自然的怀抱中实现可持续的美好未来。

4. 《老人与海》中的生态观反思

从生态文学批评维度审视《老人与海》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可解读出多重意涵。老渔夫桑提亚哥毅然驶向远洋的壮举,其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意志,折射出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豪迈姿态;而他与大马林鱼及鲨鱼群惨烈搏斗后身疲力竭、伤痕累累的情境,则成为人类因过度攫取自然资源而引发能源短缺、生态恶化等困境的隐喻性写照;此外,老人战胜大马林鱼的胜利与最终不敌鲨鱼的败局,分别象征着人类征服自然征程中阶段性的辉煌与终极性的溃败。在遭受失败后,老渔夫深刻领悟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正途,并决定回归家园。他的这一生态观念,穿越时空,在当下社会依旧极具价值,对现代人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老人与海》的生态观念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产生持续影响,与其独特的传播机制密不可分。研究表明,《老人与海》自1952年问世以来,通过与《生活》杂志整期刊登的合作、与斯科里布纳出版社的长期绑定、读书会体系的推广及国际书评的提前布局,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大众文化传播机制。这部

小说在其问世当年即被译介至中国,迄今已历经近七十年的中译传播历程。正是这种跨越媒介形态、国界疆域与时代变迁的广泛流布,使《老人与海》所承载的生态理念得以持续深化、不断被赋予新的阐释,最终融入全球生态文化记忆的版图之中。置身于科技迅猛发展、自然资源需求与日俱增的当下,我们更应从这部经典中汲取生态智慧,审视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我们不能再对自然的警示充耳不闻,肆意妄为地进行掠夺式开发。

我们要时刻牢记桑提亚哥的经历与感悟,以尊重和敬畏之心对待自然,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为自然的休养生息留下足够空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蹈桑提亚哥在大海上的覆辙,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长久和谐,让子孙后代也能在这片美丽的蓝色星球上,享受自然的馈赠,与世间万物和谐共处。

5. 结语

在小说《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桑提亚哥堪称精神维度的凯旋者——于对抗自然伟力与命运无常的搏击历程中,他守护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奏响了“崇高之人”的英雄礼赞。然而,若以现实结果论之,他又无法摆脱失败者的底色:与自然的角力仅换回“一具马林鱼骨架”,近乎空手而归。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视域加以审视,桑提亚哥的悲剧结局实则内含着逻辑上的必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终将以人的妥协或溃退收场;倘若人类肆意侵损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则必然招致来自自然的剧烈反噬。人类若要走向更为长远的未来,就必须摒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立场,尊重自然法则,爱护生态环境,顺应自然规律,守护生态平衡,全力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自然面前寻得平衡与可持续的发展路径,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和睦共处,共同缔造美好未来。

传播学视角下,生态文学的持续繁荣有赖于传播机制的不断优化。要走出“绿色传播困境”,就必须在传播主体、内容、渠道与受众四大环节形成合力——即提升作家的生态素养,增强叙事内容的审美感染力,推动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联动互补,以及健全受众生态意识的培育与反馈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已成国际共识的时代语境下,生态文学批评与传播学的跨学科协作,不仅能为生态传播提供更扎实的理论基石,更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从文学叙事向现实行动的转化提供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 [1] 胡志红,曹顺庆.西方生态批评研究[J].世界文学评论,2007(1):285-286.
- [2] 蕾切尔·卡逊,吴国盛.寂静的春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3] 王诺.美国生态文学的社会效应[J].译林,2003(5):198-201.
- [4]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5] 张芬.海明威的自然观-生态文学批评视角下的《老人与海》[J].唐山文学,2017(10):134-135.
- [6] 罗江霞,刘传江.解析生态文学批评视野下的《老人与海》[J].语文建设,2016(24):97-98.
- [7] 关华.生态批评视角下《老人与海》的悲剧解读[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40(9):55-57,66.
- [8] 赵靓.构建以“生态整体主义”为中心的后现代生态伦理观——探究美国生态批评发展新趋势[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10(4):143-146.
- [9] Christofolletti, R. (2024) Natural Heritage: Challenges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ristofolletti, R., Ed., *International Heritage*, Springer, 153-170.
- [10] Wang, Y.Z. and Liu, X. (2020) Analysis on the Water Environment Change in Niushoushan River Channel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roject Management, China (ISPM2020)*, Beijing, 4-5 July 2020, 740-744.